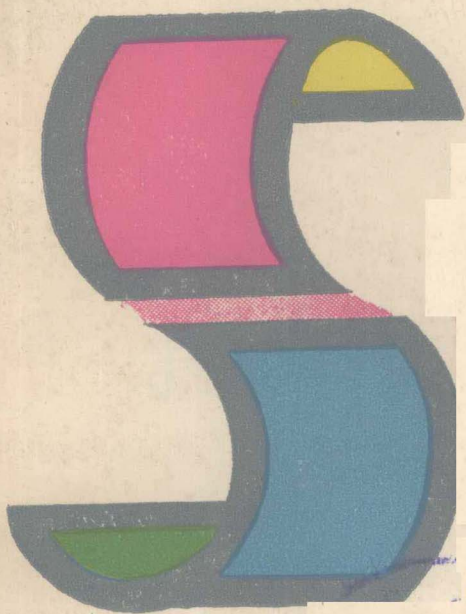




梁 劲

写作纵横谈

广西人民出版社

写作纵横谈

梁 劲

广西人民出版社

写作纵横谈

梁 劲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区党校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8印张 166千字

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850册

ISBN 7-219-00748-5/G·209

目 录

第一辑 古今写作散论

晚清的小说评论和小说创作论..... (2)

谈《艺概》的写作论..... (19)

苏轼的写作论..... (29)

筑室须基构 裁衣待缝缉..... (42)

——古人论谋篇布局

夸而有节 饰而不诬..... (56)

——古人对夸张的论述

呕心沥血 精心锤炼..... (66)

——古人论语言的运用

梁启超的小说观..... (79)

谈《史记》的人物描写..... (89)

鲁迅小说中的妇女形象..... (106)

鲜明的线索 丰富的想象..... (122)

——谈吴伯箫的《歌声》

夏衍和他的《包身工》..... (129)

谈谈毛泽东同志对比喻的运用..... (138)

谈怒的描写..... (143)

从吴道子画钟馗捉鬼谈到细节描写..... (147)

从张献忠改告示谈起..... (152)

谈肖像描写..... (154)

夸张杂谈..... (157)

——古代文论学习札记

眼睛的实写与虚写..... (160)

炼意、文眼及其他.....	(163)
---------------	---------

——古人论写作札记三则

改窜旧文与旧题重作.....	(169)
----------------	---------

谈说明文的写作.....	(174)
--------------	---------

说明文写作——材料篇.....	(180)
-----------------	---------

诗歌写作基础.....	(187)
-------------	---------

第二辑 学生作文杂谈

中学生作文的语言训练.....	(213)
-----------------	---------

中学生怎样从范文中学习写作.....	(223)
--------------------	---------

培养什么样的能力.....	(231)
---------------	---------

——中学生作文杂谈之一

应遵循的原则.....	(236)
-------------	---------

——中学生作文杂谈之二

用多种形式进行写作训练.....	(242)
------------------	---------

——中学生作文杂谈之三

谈学生的作文修改.....	(249)
---------------	---------

——中学生作文杂谈之四

第一辑

第一辑 古今中外名家散文选读

古今写作散论

写作，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社会活动。它通过文字、符号、图像等手段，将个人的思想、情感、经验等信息传递给他人，从而实现交流、沟通、记录、表达等目的。古今中外，无数文人墨客在写作领域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他们的作品不仅记录了时代，也塑造了文化。本文旨在探讨古今写作的异同，以及写作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

首先，从写作的目的来看，古今写作有着显著的区别。古代写作往往具有强烈的功利性，如科举考试中的八股文，其目的是为了通过考试，获取官职和地位。而现代写作则更加注重表达和交流，如新闻报道、学术论文、文学作品等，其目的是为了传递信息、表达观点、记录生活。

其次，从写作的形式来看，古今写作也有着明显的差异。古代写作多为文言文，讲究对仗工整、辞藻华丽。而现代写作则多为白话文，追求通俗易懂、直抒胸臆。此外，随着科技的发展，现代写作形式日益多样化，如网络文学、博客、微博等，这些都为写作的普及和传播提供了便利。

再次，从写作的主体来看，古今写作也有着不同的特点。古代写作多为士大夫阶层，他们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写作能力。而现代写作则更加广泛，几乎任何人都可以进行写作。这种变化反映了社会的进步和文化的普及。

最后，从写作的价值来看，古今写作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古代写作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通过文字记录下来的思想、情感和经验，成为后人学习和借鉴的宝贵财富。而现代写作则更加注重实用性和时效性，它为人们的生活、工作和学习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

总之，古今写作虽然存在着诸多差异，但它们都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社会中，写作已经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技能，它不仅能够帮助我们记录和表达，还能够促进我们的交流和沟通。因此，我们应该重视写作，不断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为社会的进步和文化的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晚清的小说评论和小说创作论

我国的小说评论和小说创作理论，较之一般文论、诗论迟了很多，这和小说这一文学体裁发展的起点较迟是有关系的。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已有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刘勰的《文心雕龙》等文学评论和专谈五言诗创作的钟嵘的《诗品》。诗歌创作的专著，在唐代则有皎然的《诗式》和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以后的文论、诗论、词论，则多如雨后春笋，屡见不鲜。但是，专门评论小说的较有分量的专文，则出现于明代，在我国第一部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成书之后。当时，蒋大器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序》、李贽的《忠义水浒传序》等，都是评论小说创作的专文。到了晚清，因为近代性商业都市的相继出现，广大市民对小说的爱好，外国小说大量被翻译进来，职业小说家日渐增加，便大大地促使小说评论和小说创作理论的发展。康有为曾以《闻菽园居士欲为政变说部诗以速之》一诗促邱炜萆以戊戌政变为题材创作小说的计划早日实现，提出小说流行，可以与六经争衡，并列为七（“方今大地此学盛，欲争六艺为七岑”）。继而梁启超写了不少小说评论和小说创作的专论，如《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告小说家》、《译印政治小说序》、《小说小话》

等，而《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则是“清末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关于小说理论方面具有纲领性的文章”^①。与此同时，有狄葆贤、陶曾佑、夏曾佑、吴沃尧、黄人等，均有小说评论的专文。这些文章论及小说的地位、作用、小说与人生的密切关系、小说的艺术特征和创作规律，影响较大的有狄葆贤的《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夏曾佑的《小说原理》等等，由于作者立场、观点的局限，这一时期的小说理论仍有很多不足之处，而且“论述小说社会作用的多，研究小说内部规律的少”^②，但不能不承认，他们把我国的小说评论和小说创作理论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很值得我们研究。

一、把小说的位置提到空前未有的高度，推动了小说创作的发展

在古代，我国小说的位置，远不及诗文，社会人士的心目中，也认为小说不如诗文之高雅。《汉书·艺文志》把诸子分为十家，小说家排在最末，而且指出：“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所谓“三教九流”，小说不入九流之列。虽然《汉书·艺文志》所说的小说，与后来的小说不尽相同，但这种偏见却影响到后代。塾师是不准学生偷看小说的，认为小说是闲书，不是仕途的正业，甚至有的人提出“男人不读《红楼梦》，女人不读《西厢记》”，小说不能进入高雅的文学之林。及至晚清，不少人看到小说的艺术力量，或者要利用小说达到改良政治、改良社会的目的，对小说给予高度的重视。狄葆贤对小说认识的转变，可说是具有代表性的。他说：

“吾昔见东西各国之论文学家者，必以小说家居第一，吾骇焉。吾昔见日人有著《世界百杰传》者，以施耐庵与释迦、孔子、华盛顿、拿破仑并列，吾骇焉。吾昔见日本诸学校之文学科，有所谓《水浒传讲义》、《西厢记讲义》者，吾骇焉。继而思之，何骇之有？小说者，实文学之最上乘也。”③

由此可见，狄葆贤原来对小说是看得很低的，见外国人把小说的作者和小说看得那么高，开始感到惊骇，后来经过观察、思考，真正体会到小说的价值，从而一反过去，认为小说是“文学之最上乘”者，而且说：“小说家之位置，顾可等闲视哉！”④狄葆贤这么重视小说，当然也受了梁启超的影响，他们把小说的位置提到空前未有的高度，确实使人耳目为之一新！

把小说列为文学上乘的还有陶曾佑，他在《论小说之势力及其影响》一文中说：

“二十世纪之中心点，有一大怪物焉：不胫而走，不翼而飞，不叩而鸣；刺人脑球，惊人眼帘，畅人意界，增人智力；忽而庄，忽而谐，忽而歌，忽而哭，忽而激，忽而劝，忽而讽，忽而嘲；郁郁葱葱，兀兀矻矻，热度骤跻极点，电光万丈，魔力千钧，有无量不可思议之大势力，于文学界中放一异彩，标一特色。此何物欤？则是小说。”

基于对小说的这种认识，所以他大声疾呼：“小说！小说！诚文学界中之占最上乘者也。其感人也易，其入人也深，其化人也神，其及人也广”。陶曾佑把小说列为文学界的“上乘”，显然是看到小说的艺术特点、小说的感人力量和小说

不可估量的影响。

为什么到了晚清，对小说的位置提得这么高呢？主要原因是：

（一）小说的大量产生，已深为人们所喜爱。

小说的发展，至晚清仍是一个相当繁荣的时期，种类繁多，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当时的创作小说和翻译小说，至少在千种以上，加上历代流传下来的，数量极为可观。且印刷事业比过去发达，小说得以大量发行，销路日广，尤其是都市市民，对小说有浓厚的兴趣。康有为曾这样说：“我游上海考书肆，群书何者销流多？经史不如八股盛，八股无如小说何。”⑤小说的发行量居于百书之首，可见阅者之多和影响之大。这就给小说从过去处于较低的位置，跃升为重要的地位打下了雄厚的基础，为文人学者对小说的推崇造成了客观的原因。

（二）小说对人生的巨大影响。

小说是以艺术形象感人的，对人的思想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它反映社会生活，反映人生，但反过来又影响人生，影响着社会。它可以给人以良好的榜样，也可以使人走向腐化、堕落的深渊。梁启超曾说，“用之于善，则可以造福亿兆人”，“用之于恶，则可以毒万千载”，因而他很有感慨地说：“可爱哉小说！可畏哉小说！”⑥陶曾佑也认为小说感人易，入人深，化人神，及人广，同样叫喊出：“可爱哉，孰如小说！可畏哉，孰如小说！”⑦当然，梁启超等人把小说对人生的影响看成绝对化，极端化，那是带有片面性的。特别是他们把我国人民的落后意识，迷信思想，轻信弃义，权谋诡诈，轻薄无行，沉溺声色，儿女多情，伤风败俗

等等，都归之于小说，这是十分错误的。但他们也确实看到了小说对人生的影响，对社会的影响，这点又十分可取。正由于他们看到小说的作用，才把小说的位置提得如此之高。

（三）利用小说改良政治，改良社会。

梁启超是清末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他看到了小说与政治的关系，有意识地把小说与当时的政治运动联系起来，极力提高小说的地位，以利用小说宣传改良主义者的主张。他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开宗明义地提出：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

梁启超反对禁读小说，主张用小说作为宣传教育的工具，以疏导国民，因而说：“且从而禁之，孰若从而导之。”他认为西欧各国之变革，“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之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

“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⑧梁启超的鼓吹，在当时是颇有影响的，夏曾佑也提出“欲扩张政法，必先扩张小说；欲提倡教育，必先提倡小说；欲振兴实业，必先振兴小说；欲组织军事，必先组织小说；欲改良风俗，必先改良小说。”⑨梁启超等人的政治主张是改良主义的，世界观是唯心主义的，他们对小说的作用看得十分片面，甚至把小说的作用神化了，这当然不妥，但正由于他们的大力鼓吹，小说的地位确实有了空前的提高，这又是不能抹煞的。

小说的地位的空前提高，看小说“合法化”了，小说大

量在社会上流行，而且登上了大雅之堂，这就大大促进了小说创作的发展，职业小说作家纷纷出现，小说专刊也陆续出版，仅二十世纪初几年，影响较大的小说刊物有《新小说》（梁启超主编）、《绣象小说》（李伯元主编）、《月月小说》（吴趼人、周桂笙主编）、《小说林》（黄摩西、徐念慈主编）等，在中国文史上，这个时期的小说是相当繁荣的。

二、重视小说艺术感染力的研究，对小说创作起着指导作用

晚清的小说评论，研究小说的艺术规律和艺术特征的虽然不多，但值得注意的是，评论者强调小说反映现实生活，重视了小说艺术感染力的研究，探讨了小说情节的艺术构思和人物的塑造，对于小说的创作起了很好的指导作用。

当时，研究小说的具体作用的文章不少，见解不一。吴沃尧认为小说可以“补助记忆力”，可以“输入知识”，^⑩惺园退士认为小说可以使人“善善恶恶”，“见贤思齐贤，见不贤而自省也。”^⑪这些见解均未能抓住小说这一文学体裁的艺术特征加以阐述，而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紧紧抓住小说的艺术感染力这一主要方面去研究，提出小说支配人的力量有四种：一曰“熏”，二曰“浸”，三曰“刺”，四曰“提”。“熏”，就是熏染，读者不知不觉为小说中的人和事所感染。“今日变一二焉，明日变一二焉；刹那刹那，相断相续；久之而此小说的境界，遂入其灵台而据之”。在《告小说家》一文中，梁启超也详述了小说

对读者的熏染作用，认为小说“熏染感化之伟大，举凡一切圣经贤传诗古文辞皆莫能拟之”。可见他对小说的艺术感染力有足够的估计。“浸”，比熏又深了一层，“入而与之俱化”为“浸”，比如，“读《红楼》竟者，必有余恋余悲，读《水浒》竟者，必有余快余怒”，这种“浸”之力，“往往终卷后数日或数旬而终不能释焉”。这是读者的感情与小说中人物的感情发生了共鸣，受了极深刻感化的结果。“刺”，就是刺激，是读者受到小说中人物的感染、俱化而发生感情的突然变化而“不能自制”。他举例说：“我本葛然和也，乃读林冲雪天三限，武松飞云浦一厄，何以忽然发指？我本愉然乐也，乃读晴雯出大观园，黛玉死潇湘馆，何以忽然泪流？我本肃然庄也，乃读实甫之《琴心》、《酬简》，东塘之《眠香》、《访翠》，何以忽然情动？若是者，皆所谓刺激也”。“提”，就是受了“熏”、“浸”、“刺”之后的一种强烈的反应。“熏”、“浸”、“刺”三者是“自外而灌之使入”，而“提”就是“自内而脱之使出”，要见之于行动了。梁启超认为，“凡读小说者，必常若自化其身焉，入于书中，而为其书之主人翁”。读《红楼梦》自拟贾宝玉，读《水浒传》自拟黑旋风、花和尚，已“化其身以入书中矣”。这是受小说中的艺术形象、思想感情潜移默化到了极点，是小说的艺术感染力发生了显著作用的表现。梁启超根据小说的艺术特征，把它对人生的影响，归纳为这四种力，强调小说对读者的艺术感染作用，这固然促使人们对小说的重视，大大提高了小说的位置，同时，也提醒作者在写小说时，不要抽象说教，要注意环境的描写和人物形象的塑造，使之有血有肉，有个性，有感人至深的思想感情；否

则，就不能产生这四种力。这些评论，对于小说中的概念化、公式化、粗制滥造，无疑是一种严厉的批评，对于提高小说创作的艺术技巧，其用意也是非常明显的。

狄葆贤的《论文学上小说的位置》，把小说的艺术特征概括为“繁”、“今”、“泄”、“俗”、“虚”五个方面。所谓“繁”，是和古史诗传相对而言的。“同一义也，而纵说之，横说之，推波而助澜之，穷其形焉，尽其神焉，则有令读者目骇神夺，魂醉魄迷，历历然，沈沈焉，与之相引，与之相移者矣，是则小说之能事也。”⑫小说要真实地反映生活，对环境的描写，必须细腻逼真，使人如临其境；对情节的开展，必须波澜起伏，使人如遇其事；对人物的刻画，必须形象鲜明，有思想有个性，形神兼备，使人如见其人，只有这样，才能使“读者目骇神夺，魂醉魄迷，历历然，沈沈焉”。这当然就“繁”了。所谓“今”，是与古对的。作者强调小说要反映现实生活，因为“以过去未来导人，不如以现在导人”，所以，“小说者，专取目前人人共解之理，人人习闻之事，而挑剔之、指点之者也。”⑬强调“今”当然对，小说创作，选取现实生活的题材，这应该是主要的，但一刀切，完全否定历史上的题材，则《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等历史小说，又如何能产生呢？这是作者概括得不周之处。所谓“泄”，是与“蓄”对的。狄葆贤认为“小说者，社会之X光线也”，也就是小说反映社会生活要深入本质，解剖人生要深刻透彻，正如“扁鹊所谓见垣一方人，洞悉五脏症结”，“罔两魑魅，无复遁形。”与诗词相比，“诗词等韵文，最以蓄为贵也……小说则与诗词正成反比例者也。”⑭所谓“俗”，是与“雅”对的。狄葆贤

认为“中国文字，衍形不衍声，故言文分离，此俗语文体进步之一障碍”；“俗语文体之流行，实文学进步之最大关键也”。小说创作，应用“俗语文体”，可以用“各省的方言”，使“言文一致”，口语化。这是概括了小说的语言通俗易懂的特点。所谓“虚”，是与“实”对的。“文之至实者，莫如小说；文之至虚者，莫如小说。”“虚”，说明小说的人物、情节是以现实生活为基础，以一定的人和事作为原型，经过作者的想象、虚构，用艺术概括的手法写成的。

“实”应是生活的真实、艺术的真实；“虚”则是虚构，指艺术上的夸张，即所谓“举想也梦也讲也剧也画也合炉而冶之”，故能“导人于他境界”。以上五个方面，都涉及了小说的人物塑造、小说的情节安排、小说的环境描写、小说的语言运用等问题，关键也是如何使小说能感人，易感人，更有效地发挥它的艺术感染力，所以该文不失为“一篇从文学内部规律的角度去研究小说特点和性质的不可多得的专题论著”。^⑮当然，这些理论仍然是很雏形的，不可能把小说的艺术特点概括得很全面，也不可能象我们今天谈论创作小说时，对如何描写环境、开展情节、塑造人物等提得那么明确，但这些研究，对于当时的小说创作，必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对小说创作思想与写作技法的探讨

经过梁启超、狄葆贤诸人的大力推崇与鼓吹，小说的位置已空前提高，作者日增，研究与探讨小说创作思想与写作技法的文章也不少。当时研究的有几方面的问题。

（一）小说创作要“裨益社会”。

梁启超等人对于中国古代的小说持否定的态度，他们认为我国人的状元宰相思想，江湖盗贼思想，迷信邪魔思想，伤风败俗，绿林四起等，皆“小说之故”。梁启超等不从产生这种思想行为的社会根源去分析，不从小说作为一种文学体裁，首先是现实生活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去理解，而把这些落后的思想行为，统统归之于小说，甚至把一些会党和起义的人民反抗清朝残酷统治的活动，也咒骂为“绿林大盗”，诚然十分错误。但是，从中也可以看到，他们极力要求小说创作要有补于国，有裨益于社会，要为改良政治、改良社会服务。对于那些为一己的私利而写小说的人，他们是极力反对的。王无生在《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中对那些不考虑如何“惊醒国民”，不考虑如何“裨益社会”，只考虑“若何可以得重资”的小说作者，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指责他们“不惜欺千人之目，以逞一己之私，为个人囊橐计，而误人岁月，费人金钱不顾”，这些人的人格低下，不能“以小说重任畀之”，可见他们对小说创作的目的，有很明确的要求。

（二）小说创作要“寄情托意”。

文学作品要宣泄作者的情志，或讴歌，或哭诉，或慷慨陈词，或凄惋泣怨，自古皆然。“《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庄子》为蒙叟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诗集为杜工部之哭泣。李后主以词哭，八大山人以画哭。王实甫寄哭泣于《西厢》，曹雪芹寄哭泣于《红楼梦》”。①刘鹗自称：“吾人生于今之时，有身世之感情，有国家之感情，有社会之感情，有种教之感情。其感情愈深者，其哭

泣愈痛。此洪都百炼生所以有《老残游记》之作也。”^{①7}王钟麒在《中国历代小说史论》中，把小说创作的原因归为三个方面：一是“愤政治之压制”。作者对当时的政治不满，或者自己受到统治者的压制，有志不能伸，因而借小说以渲泄其愤懑。“士之不得志于时而能文章者，乃著小说，以抒其愤”。他认为“若《隋唐演义》，若《列国志》诸书，言民怒之不可犯，溯国家兴亡盛衰之故，使人君知所惧”；《七侠五义》、《水浒传》之作，“则设为悲歌慷慨之士，穷而为寇为盗，有侠烈之行，忘一身之危，而急人之急，以愧在上位而虐下民者”。二是“痛社会之混浊”。作者忧时伤世，欲改变社会之现状，扫掉污泥浊水，不得不借助于小说。“或描写社会之污秽浊乱贪酷淫冶诸现状，而以刻毒之笔出之，如《金瓶梅》之写淫，《红楼梦》之写侈，《儒林外史》、《梼杌闲评》之写卑劣。读诸书者，或且訾古人以淫冶轻薄导世，不知其人作此书时，皆深极哀痛，血透纸背而成者也，其源皆出于太史公诸传”。三是“哀婚姻之不自由”。封建社会，恋爱婚姻不自由，“然一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执路人而强之合”。作者同情青年男女对这种不合理的婚姻制度之不满，要为他们说话，要为他们控诉，要反映他们追求婚姻自由的愿望，“于是构为小说，言男女私相慕悦，或因才而生情，或缘色而起慕，一言之诚，之死不二，片夕之契，终身靡也”。以上三方面，是归纳历史小说创作的原因和动机，说明都是寄情托志的。在明代，李贽曾提出“古之圣贤，不愤则不作”，而且肯定《水浒传》是“发愤之所作”。^{①8}到了清末，似觉更强调写小说要寄情寓意。王钟麒在分析完小说创作的三方面原因之后，公开宣